

2008 年第 4 期
(第 28 卷总第 122 期)

贵州民族研究
Guizhou Ethnic Studies

No.4,2008
(Vol.28.General.No.122)

“他者” 的消失：文化表述中的畬汉融合

温春香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畬民作为中国东南历史上异于汉人的人群，自宋元至明清，文人就对其有诸多描述。然而时间越往后，关于畬民的记载也变得越少，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畬汉的互动与融合，畬汉的这种融合途径是多样的，也是畬汉双向的，其中既有通婚、收养等血缘上的混化，也有互相隐匿的地缘上的融合，更有国家等外力作用下的推进，因此历史上既存在畬融于汉的可能，也有汉融于畬的可能。

关键词：异己；畬民；汉人；融合

中图分类号：C912.4.83；G12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6959 (2008 04- 0059- 06)

The Disappear of “ the Other ” :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he and the Han i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WEN Chun- xiang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s a different people from the Han , the She were reported by the Han intelligentsias again and again from Song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 bu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he becomed less and les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it is becaus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he and the Han people ,and their integration is a two- way.

Key words: the Other, the She, the Han, integration

作为素有撰史传统的国度，传统知识精英在很早以前就非常关注生活于其周边的“异己”人群。畬民作为唐宋以来中国东南颇为独特的人群，其习俗、信仰、劳作方式等都倍受时人所关注。关于畬民的记载，自宋元至明清屡见不鲜。然而时间越往后，关于畬民的记载也变得越是淡化，或是承袭旧说，或作无从考证之叹。及至如今，闽粤赣毗邻地区，人们很难从日常生活中立刻分辨出畬与汉。这是由于这个曾经明显异于汉文化的人群渐渐“化为土著”，而这个过程事实上也是双向的，而非仅仅单向进行，畬汉的融合也有多条途径可达，这其中既有畬的汉化，也有汉的畬化。

一、作为“异己”的书写——文献记载中所见之畬民

活跃于中国东南的土著人群，早者有山都木客之说，或作兽类，或作鬼类，皆为异己记载之开端。但因其去向不明，后人亦只作“姑妄”之说。而畬民的记载，则自宋元以来，及至明清、民国，皆有连续见证。自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畬》一文明确提出畬民名称，畬民便作为一个有别于华夏之人群见诸笔端，作为猎奇也好，作为华夷之防也好，甚至于作为“与齐民无别”的强调也好，其实皆反映出

收稿日期：2008- 06- 04

[作者 温春香 (1980-)，女，江西宁都人，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200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东南族群、历史人类学。

· 59 ·

畬民作为“异己”的存在与汉人知识精英的看法。

检视现存史料,南宋刘克庄之《漳州谕畬》是最早明确提出“畬民”称呼的。在该文中,我们可知漳州之畬民分为西畬、南畬两种,“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獠、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畬。西畬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畬隶漳浦”。他们有自己的劳作方式,通行刀耕火种,以狩猎为生,不事赋役,“二畬皆刀耕火耘,厓栖谷汲,如猿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畬民不悦,畬田不税,其来久矣”。且有自己集团独特的祖先崇拜,即崇拜盘瓠,“余读诸畬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1]

在刘克庄之后,关于畬民的记载不绝于书,其中尤多见于地方志。作为具官方色彩的地方志书写,普遍地将畬民问题纳入到视野中,在广东多见于惠潮二府,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所修之《惠州府志》有详细记载:“其在惠者俱来自别境,椎结跣足,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它徙。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峯,故称獠,所止曰峯。自信为狗王后,家有画像,犬首人服,岁时祝祭。其姓为盘蓝雷钟苟,自相婚姻,土人与邻者亦不与通婚。獠有长有丁,国初设抚獠土官领之,俾略输山赋,赋论刀为准,羈縻而已。又之稍稍听征调,长枪劲弩,时亦效功,然此獠颇驯伏,下山见耆老土人皆拜俯,知礼敬云。”^[2]

在记载中,畬字亦作“峯、畬、峯”书写,畬人又称獠人。在此,人们可清楚地知道畬民刀耕火种,善于射猎,以采集为生活辅助,食尽一山则迁徙,祭祀盘瓠,与汉人不通婚姻。即便便有所谓输山赋,亦只是象征性的。在此我们可大胆的猜测,作者对于畬民自相婚姻的强调,一方面是作为畬民习俗的介绍,而更深层次似乎是在将畬民与汉人作血统上的区别。而以上引文中所涉及的基本要素在别处记载中也时常见。

如潮州府的畬民就极相似,“其曰峯户者,男女皆椎发跣足,依山而居,迁徙无常,刀耕火种,不供赋役,善射猎,以毒药涂弩矢,中兽立毙”。^[3]

他们有两个种类,“潮州府,民有山峯,曰獠獠,其种有二,曰平鬚,曰崎鬚。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有病歿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俗有类於夷狄,籍隶县治,岁纳皮张,旧态无所考,我朝设土官以治之,衔曰峯官。”^[4]畬民的这些特征与前文记载皆大同小异,在程式化的描述之余,其简短的评论——“俗有类於夷狄”却让我们窥见汉人知识精英所流露出的华夷之别。

而更为甚者,明嘉靖年间所修的《兴宁县志》则从祖源上将其与汉人作了“明确”区分。将“獠人”祖图所言之图腾传说作为信史解读,认为其世出盘瓠,故在称谓上“皆从犬”,以污名手段将其与汉人决裂。认为畬人与汉人祖源不同,血统不同,言语不同,甚至于劳作方式也不同。“獠人亦多种,传记多载。余尝得其世出图观之,大抵祖槃瓠,亦有次第,自信为狗王后不讳,故谓獠猺猺等字,皆从犬,亦信。然散处南粤,在在皆有之,大抵依聚山林,斫树为峯。”^[5]

也许是见了不少诸如此类的记载,一些汉人开始反省前人对畬民的描述。崇祯《兴宁县志》的修纂者许是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为“王化”作些什么,于是在论及“猺蛋”时,表现得颇为语惊四座。“按吴志名猺蛋曰夷狄,令人愕然。求其说而不得。此非山戎氐羌之比,错居中土,衣冠与世同,无复椎结之习,一耕于山,山有粮,一渔河,河有课。既籍其名於版,子孙数十世势能徙居塞外矣乎?出入同乡井,又能区分限域矣乎?王者无外,听其蠃飞蠕动于穹环之间,亦齐民矣。已恶得而狄之。”^[6]

然而,所需强调者,往往亦是存在危机者。纂修者这一用心良苦的强调,更明确地反映当时汉人将畬民“狄化”之普遍。

非但知识精英如此,与畬民毗临而居的下层百姓亦无例外的“异化”畬民。

范绍质撰写于清初的《猺民纪略》对福建畬民的状况作了详细的交代。从记载中我们可知,作为普通百姓的“乡人”与畬民之间有明显的族群界线,乡人有专门对这一群人的称呼,即“畬客”,其独特的生活劳作方式也作为族群的外显标识为汉人知识精英所一再强调。“汀东南百余里有猺民焉,结

庐山谷，诛茅为瓦，编竹为篱，伐荻为户牖，临清溪，棲茂树，阴翳蓊郁，窅然深曲。其男子不巾帽，短衫阔袖，椎髻跣足，黎而青眼，长身猿臂，声哑哑如鸟，乡人呼其名曰畬客。”^[7]

而从乾隆年间修纂的《福州府志》中所引《连江县志》我们同样可看到的是，在汉人视其为“异种”的同时，畬民对于“我者”与“他者”亦有明确区分，这从其对汉人的称呼上可一目了然。“连深山中有异种者曰畬民……其民短衫跣足，妇人高髻，蒙布加饰如瓔珞状，亦跣而杂作。以其远近为伍，性多淳朴，亦受民田以耕，谓平民曰百姓”。^[8]

江西兴国的畬民则被人们称为“山野子”，并被邻郡之汉人讥笑为“异类”。

“太平乡崇贤里有山民户。……号为‘山野子’，其人多雷、蓝、毕三姓，……邻郡皆哂兴邑山民为异类，与猺獠狼黎比。”^[9]

作为“异类”的畬民即便与汉人有少量的接触，也是不受礼敬的。“福建、江西、广东深山中有畬民，同於猺獠，不与平民相接。有作工於民家者，食之阶石，不以人礼待之。”^[10]

因此，无论是汉人知识精英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皆把畬民视为有别于己的“异类”这一现象是广泛存在于历史上的，甚至是把其作为低自己一等的人群存在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东南这片地区历史上确曾生活着一批与汉人迥异的人群。在长期的生活中，他们形成了明显有别于当地汉人的劳作方式，日常习俗，乃至信仰。随着山区的开发，这些与汉人有如此殊别的人群与汉人何以相安无事，他们又为何渐渐消失于人们的视线？“迁徙论”是不是足以解释这些问题？这就是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二、“异己”的清失——明清时期畬汉融合

随着山区的日益开发和人群的日渐交融，畬民慢慢的从人们的视野中清失。那些早期对畬民的记载渐渐地变成一种奇异的印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已从人们记忆中消失。而所谓的消失，并非指这一人群事实上的消亡，而是指曾经作为指认该人群明显异于汉人的外显标识的消融。

对于明显有别于汉人的畬民去向何处，当时人多认为是其皆化为土著。从万历时所修《广东通志》中已见端倪：“畬蛮，岭海随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种为名者也，衣服言语渐同齐民”。^[11]

而修于康熙年间的《平和县志》对此给出了较详细的答案：“今则太平既入，声教日讫，和邑诸山木拔道通，瑶僮安在哉？盖传流渐远，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瑶僮而化为齐民，亦相与忘其所自来矣。”^[12]

光绪温仲和所修之《嘉应州志》所言亦同，“今地以畬名者尚多有之，而所谓猺獠则绝无其人，盖日久皆化为熟户，而风俗与居民无异矣”。^[13]

民国的闽西畬民与汉人也无从分辨，“今则男子衣帽、发辫如乡人……虽峒瑶有亦无异于乡里中编氓也”。^[14]

更为甚者，那些曾经作为人们谈资的畬民故事也无人再提起，如民国郑丰稔所言：“余在儿童时代，蓝雷故事，尚为童话中之时行材料，今则未闻有谈及者，盖式微矣。”^[15]

从修纂于不同年代的五个版本的兴宁地方志中我们可梳理出畬民与汉人融合的大概历程。

修纂于明正德年间的《兴宁县志》：“瑶之属颇多，大抵聚处山林，斫树为葦，刀耕火种，采山猎食，嗜欲不类，语言不通，土人与之邻者不相往来，不为婚姻。本县瑶民亦众，随山散处，岁输山粮七石正。”^[16]就如我们上面已谈及的，类似的记载在当时还可找出很多。如果没错，这段记载至少反映了明中前期畬民的基本状况，或者至少，反映了当时知识精英的一种普遍的记忆。

而时隔几十年后，修纂于嘉靖年间的《兴宁县志》则添加了一些内容。“瑶人亦多种，传记多载。余尝得其世出图观之，大抵祖槃瓠，亦有次第，自信为狗王后不讳，故谓獠狔狔等字，皆从犬，亦信。然散处南粤，在在皆有之，大抵依聚山林，斫树为葦。”^[17]以上添加的这些内容为作者所见，无论其表述背后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这时，人们对畬民还并不陌生。

然而,这种印象也就此停留在人们的意象之中了,约在百年之后所修的《兴宁县志》,就明确表示以前并不陌生的这群畬民皆化为土著了。“徭本盘瓠之种,亦有次第,自信为狗王后不讳,散处南粤,在在有之。大抵依聚山林,斫树为耨,刀耕火种,采实猎毛,嗜欲言语不同土人,与之邻者亦不为婚姻。随山散处,岁输出粮,事同羁縻而已。……今皆化为土著。”^[18]再时隔约半个世纪,重修的《兴宁县志》在述及畬民皆化为土著时所作的按语中,更发出前事无从考的慨叹:“宁赋有徭人山米,即徭僮之岁输山粮也。然久无。徭人输糠者,据前志云今皆化为土著,独不记其何年始将山米并归民粮,其化为土著亦不记其承籍与否,卒不可考,一阙事也。”^[19]由此可知,此时人对畬民之印象全靠前人所记,无此,便无从知晓了。

及至清末,兴宁学者罗献所修之《兴宁乡土志》再一次表明:“徭之别种曰畬,刀耕火种,采实猎毛,……种族混灭,不可考耳。”^[20]

在此,“百年”“半个世纪”并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时段来探讨,百年或半个世纪并不反映当时人们对畬民的意象变化的实际时间。但其所表现的时序先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所反映的正是时间上继替与人们认识间的变化。故而,在此,时间序列的“先后”变得格外重要。也正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从兴宁志的时序中窥见人们意象的变化。

但是,如果仅从正史或地方志等文类探讨的话,以上所反映的现象确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汉人知识精英的这种记忆所持续的时间也有长期的延续性。但这却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畬汉融合只是单纯的畬融于汉的过程。事实上,不同人群的融合绝非以单线进行,当我们转而关注畬民自身的叙事时,我们发现,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或者说,所谓的“化为土著”远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的。畬民与汉人的交流与混化有多种途径可达,他们的融合也是双向的,生活于民间的人们有他们自己的运作模式与方法。

三、历史上畬汉融合的几种途径

两种界线分明的人群何以混化至无分彼此,其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人群间的日常交往了,比如日常生活、经济的往来。而对于特殊的历史时期而言,还包括共同抵抗外来势力所导致的合作。

畬民虽主要以耕山游猎为生,但亦有不得不与汉人发生接触时。“大抵瑶抵峒皆依山负险,性情卤莽,与良颇异,然衣食器皿悉取给于近县村落。”^[21]因此,畬民也常入市贸易。“入市贸易易丝,率俯首不敢睥睨”^[22]道光《建阳县志》也说明畬民“与汉人交接历有年”。^[23]这一接触的过程本身就是双向的流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经济的日益依赖,文化与习俗亦日渐互染。

与此同时,在时局动荡的年代,畬民与汉人之间的界线时时飘移,许多汉人也逃入畬民之中,以求庇佑。如南宋时的赵必岳,字次山,“乡寓公吴允文浚奉密诏以江西招讨使举义反正,结约次山协谋兴复,战不利。允文奔漳州为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杀,次山解兵隐汀州之畬中,踰年以疾终。”^[24]

因为战争或动乱等原因,同时也是由于畬民不赋不役的诱惑,使众从汉人隐于畬中。如明代江西“吉安府龙泉、万安、泰和三县并南安府所属大庾等三县居民无籍者,往往携带妻女,入耨为盗”。^[25]而清朝广东潮州府则有“雷公岭,……层冈叠嶂,为潮惠二县之界,奸民逋赋役者,辄藉口邻封,彼此窜避,或托为徭獠逃化外。”^[26]

其次,血缘上的混化是最直接的方式。

畬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群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他们不与汉人通婚,从血统上保持其内部的独立性与稳定性。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畬民亦与汉人互相通婚。在这方面,郭志超先生打破传统研究的樊篱,利用畬民族谱资料作了专门论述,认为在历史上其实存在不少畬民与汉人通婚的情况,导致人们误以为畬族只与本族通婚的原因是,那些方志、文集的作者没有将汉化较高的定居畬民包括在畬民里。^[27]此外,我们也可从地方志所见,在乾隆年间畬民已开始和汉人通婚。“邑有畬民,……近又与土民联婚,并改其焚尸浮葬之习,亦足见一道同风之化云”。^[28]从晚清建阳的经验我

们可以看出，畬民与汉人通婚，多遵汉人习俗。“近惟嘉和一带畬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29]

在通婚方面，族谱的记载应是较可靠细致的材料，而方志记载的重要性在于，它所反映的是当时较为流行与普遍的一种行为。

相对于通婚，收养则是另一条血统混化的途径。下面的一段记载就是平和何仓蓝氏畬民收养汉人何氏之子，这是对畬汉血统混化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平和蓝氏入漳始祖蓝琛曾仕元，元亡之际，从江西避乱至漳。蓝琛公五世孙源泰于明永乐年间迁居平和县南胜何仓，为开基何仓一世祖，汉人何姓彦璋公出嗣源泰公为子，为二世祖。“添河公三子彦璋公出嗣何仓蓝家，为蓝源泰之子，后裔为蓝氏。”^[30]但事实上，根据何仓蓝木龙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彦璋公后裔也有回归汉人何氏家族中的。

“彦璋公配蔡氏，生七子。文琛、文其、文清、文生、文乐、文林、文树。文琛、文清、文乐后裔居何仓；文其后裔居漳浦大南坂；文生、文林后裔居平和县山格镇，文树回归何氏，居何地何空楼。”^[31]

谱中所提到的何仓今作禾仓，上面的这一记载收录于福建云霄、平和《何氏族谱》中。而彦璋公后裔分布简况的资料则由何仓蓝木龙提供。历史上，这种畬民收养汉人的例子虽不常见，但在民间实际上也还是存在的。而且，在畬民作为一个独立民族被识别后的今天，这样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32]最后，作为外力之国家在这一融合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

明朝闽粤赣边区新县的大量设置及国家教化的推行使畬民归于王化。由唐以来，闽粤赣边区就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盐寇”、“峒寇”、流民等时时引发动乱，作为国家触角未深入之地，族群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历史上随山散处的畬民也是构成地方动荡的一股力量。不仅畬民、流寇，当地民人也会身不由己地卷入斗争中，这将使事态更为严重。南赣巡抚就是为处理闽粤赣湘交界地区事务而设。在南赣巡抚设置前后，闽粤赣交界区共设新县达22个之多，其中4县为南赣巡抚设置前所添。^[33]经过这一规模浩大的新县设置，闽粤赣交界地区人民活动直接为王朝所控制，昔日的“盗区”变成国家统治下的“政区”。

随着县治的建立，政府也积极的推行国家教化，对畬民也进行编保甲，把畬民纳入国家主流文化体系。这在许多方志里都有体现，如道光《龙岩州志》中记载：“今畬客固安分，许其编甲完粮，视土著之民一例。”^[34]民国《德化县志》也说入清后，畬民“遂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别。”^[35]

族群最本质的内容即是有一个异己的对立面的存在，通过对比反观自己有别于他者，当自己与这种参照物渐渐趋同时，文化的界线与族群的界线也就慢慢消失。当然，上引史料也反映了汉人知识精英过于简化的表达，在他们眼中，王朝的力量大于一切，因为这种对王朝力量的无限放大，导致他们看不到更多复杂的历史过程，那些存在于民间的互动过程。

对于众多汉人知识分子来说，对于“异己”的记载，一方面固然出于好奇之心，将畬民视为一个异己人群，将其奇风异俗作为一种谈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汉人知识精英历来所具有的为王朝统治服务的思想，记载这些畬民，是为了便于统治者更好的对其进行统治。因为有如此重要的“使命”，只要有“异己”的存在，便有关于“异己”的书写。而随着日益的交流与接触，当“异己”群体不再有明显的可认之处时，便没有太多强调的必要。因而渐渐作为“拾遗”来书写，将其视为宣扬王化的见证。这一表达明显的体现在“化为土著、与齐民无别”这一说法上。然而事实上，随着地区的开发与国家的直接进入，即使是像畬民这样“自相为婚，不与齐民往来”的人群，也最终难免与汉人融合。畬汉的这种融合途径是多样的，也是畬汉双向的，其中既有通婚、收养等血缘上的混化，也有互相隐匿的地缘上的融合，更有国家等外力作用下的推进，因此历史上既存在畬融于汉的可能，也有汉融于畬的可能。而畬汉这种跨民族融合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也是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 (宋) 刘克庄. 后村集[M]. 卷九十三 记. 四部丛刊本.
- [2] (明) 姚良弼修, 杨宗甫纂. 惠州府志[M]. 卷十四 外志·猺蛋.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3] (明) 戴璟, 张岳等纂修. 广东通志初稿[M]. 卷之十八 风俗 潮州. 明嘉靖刻本.
- [4] (明) 戴璟, 张岳等纂修. 广东通志初稿[M]. 卷之三十五 猺獞. 明嘉靖刻本.
- [5] (明) 黄国奎等纂. 兴宁县志[M]. 卷之三 人事部·猺蛋. 上海: 上海书店, 1990.
- [6] (明) 刘熙祚修, 李永茂纂. 兴宁县志[M]. 卷之六杂纪·猺蛋. 北京: 中国书店, 1992.
- [7] (清) 曾日瑛等修, 李绂等纂. 汀州府志[M]. 卷之四十一 艺文.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7.
- [8] (清) 曾煜. 福州府志[M]. 卷七十六 外纪二. 清乾隆十九 (1754) 年刊本.
- [9] (清) 张尚瑗纂. 潞水志林[M]. 卷之十七 志事·近录. 康熙五十年 (1711), 2001年重印本.
- [10] (清) 纳蘭性德. 通志堂集[M]. 卷十五淶水亭杂识一. 清康熙三十年 (1691) 徐乾学刻本.
- [11] (明) 郭棐纂修. 广东通志[M]. 卷七十外志五. 济南: 齐鲁书社, 1996.
- [12] (清) 吕天锦. 平和县志[M]. 卷一二杂览志.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7.
- [13] (清) 吴宗焯等修, 温仲和纂. 嘉应州志[M]. 卷三十二丛谈. 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刻本.
- [14] (民国) 黄恺元等修, 邓光瀛, 丘复等纂. 长汀县志[M]. 卷三十五 杂录·畬客.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 [15] (民国) 郑丰稔. 龙岩县志[M]. 卷四氏族. 民国三十四年 (1945) 刊本.
- [16] (明) 祝允明纂修. 兴宁县志[M]. 明正德十年 (1515) 刻本. 1962年上海中华书局影印明正德稿本.
- [17] (明) 黄国奎等纂. 兴宁县志[M]. 卷之三人事部·猺蛋. 上海: 上海书店, 1990.
- [18] (明) 刘熙祚修, 李永茂纂. 兴宁县志[M]. 卷之六杂纪·猺蛋. 北京: 中国书店, 1992.
- [19] (清) 王纶部纂修. 兴宁县志[M]. 卷六人物志. 北京: 中国书店, 1992.
- [20] (清) 罗献编. 兴宁乡土志[M]. 人类. 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 抄本.
- [21] (明) 张二果, 曾起莘著. 东莞县志[M]. 瑶. 崇祯十二年 (1639) 抄本, 东莞市人民政府印, 1995.
- [22] (清) 曾日瑛等修, 李绂等纂. 汀州府志[M]. 卷之四十一艺文记·猺民纪略. 台北: 成文出版社.
- [23] (清) 江远清, 江远涵. 建阳县志[M]. 卷二輿地志·附畬民风俗. 道光十二年 (1832) 刊本.
- [24] (元) 刘垕. 隐居通议[M]. 卷九诗歌四·云舍赵公诗.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5] (清) 黄鸣珂修, 石景芬纂. 南安府志[M]. 卷二十四艺文七. 同治七年 (1869) 刊本.
- [26] (清) 周碩勳. 潮州府志[M]. 卷十六山川. 清乾隆二十七 (1762) 年修. 光绪十九年 (1893) 重刊本.
- [27] 郭志超. 从谱牒资料看畬汉通婚. 闽台民族史辨[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6. 212-244.
- [28] (清) 郑一崧. 永春州志[M]. 卷七风土志. 清乾隆五十二年 (1787) 刊本.
- [29] (清) 江远清、江远涵. 建阳县志[M]. 卷二輿地志·附畬民风俗. 道光十二年 (1832) 刊本.
- [30] 云霄、平和何氏族谱[M]. 内部版2005.1017.
- [31] 云霄、平和何氏族谱[M]. 内部版2005.1017.
- [32] 详见王逍. 收养与继嗣: 畬汉互动的特殊纽带. 畬族文化研究论丛[Q].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 198-211.
- [33] 唐立宗. 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M]. 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 (119), 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 2002. 367-368.
- [34] (清) 彭衍堂. 龙岩州志[M]. 卷二十杂记. 清道光十五年 (1835) 修. 光绪十六年 ((1890) 重刊本.
- [35] (民国) 方清芳. 德化县志[M]. 卷三风俗志. 民国二十九年 (1940) 铅印本.

(责任编辑: 石 舫)